

科技异化与伦理之思：论欧茨《无影之人》中的科学书写

石嘉璇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欧茨小说《无影之人》中的科学书写以“唯科学主义”的科研理念、“科技单向度”的思维方式和“以人为本”的情感反思为主线，深入探讨现代神经科学研究面临的伦理困境。“唯科学主义”聚焦科学实验室非道德的运行模式，揭示功利主义思想中的科技异化；“科技单向度”以科研人员数据至上的人生信念和身份认同危机为表征，批判工具理性中的认知局限；“以人为本”借助对生活世界的展现，体现应对科技伦理危机的策略与方法。欧茨的科学书写并非对科技的简单评价，而是对技术时代伦理危机的有力诊断，引导读者深思科技与人文并重的科技伦理思想，彰显科学求真精神与人文向善价值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无影之人》；科学书写；伦理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5)05-0059-07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 1938-)是美国当代最多产且创作主题最广泛的女作家之一,其作品主要关注创伤、伦理、种族、性别、暴力等主题。近年来,科学问题以文学形式进入欧茨的创作视域,表明她试图“在科学的使命里建立一系列原始的联结,以理解人类心灵深处难以琢磨的运作机制,体现人文科学对爱的探索”^①。欧茨的科学书写隐含着作者对科技文明的关注,展现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对话的必要性,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小说《无影之人》(*The Man Without A Shadow*, 2016)以一个现代神经记忆科学实验室为叙事场域,讲述了脑科学研究专家在健忘症患者伊里胡(Elihu Hoopes)研究项目(以下简称“E.H.研究项目”)中的科研日常、科研思维及科研心理等,具有浓厚的科学气息。对于小说中的科学书写,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其文学价值、科学理性及社会影响等方面,而对小说中的科技伦理思想缺乏深入挖掘。殊不知,欧茨对科学书写的伦理指向有着强烈的追求。在小说扉页,她提到将此书献给小说的第一位读者查理·格罗斯(Charlie Gross)。格罗斯是欧茨的第二任丈夫,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神经系统研究的科学家。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人文学者欧茨与科学家丈夫格罗斯的对话,隐射他们对当今神经科学发展的探究与思考。此外,在谈及文学艺术与伦理的关系时,欧茨认为:“所有写作最深刻的含义在于感觉、心灵和信念的力量,任何语言在解释、表达、总结之后都会改变事物的本质。”^②该观点的言外之意表明写作的本质并非语言本身,而是语言解释之后的深层含义。因此,欧茨的科学书写并非只关注科学本身,而是“借助深入的研究与哥特式想象力,以诡异而富有蛊惑力的笔调,演绎了精神损伤带来的折磨,展现了科学的奇妙与冷酷”^③。然而与其他哥特小说不同,欧茨在其作品中很少涉及暴力情节与恐怖主义气

收稿日期:2025-06-20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4YBA143)

作者简介:石嘉璇(1988—),女,湖南怀化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

①Anderson, Eric K. “Review of Joyce Carol Oates’s *The Man Without a Shadow*”, *Bearing Witness: Joyce Carol Oates Studie*, 2016, 3(1): 1-3.

②Oates, J. C. “Art and Ethics? —The Futility of Art”, *Salmagundi*, 1996(111): 75-85.

③Donna S. “Reviews”, <https://celestialtimepiece.com/2015/12/07/the-man-without-a-shadow/>.

氛,而是从科技异化的视角来呈现人类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以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复杂关系。鉴于此,基于小说中呈现的科学图景,从“唯科学主义”的科研理念、“科技单向度”的思维方式及“以人为本”的情感反思三个维度阐释科学书写的特征,深入探讨技术时代的科技伦理问题,挖掘欧茨笔下科技异化与人类身份认同危机的原因,有助于引导读者深思科技与人文并重的科技伦理思想,彰显科学求真精神与人文向善价值的辩证统一。

一、“唯科学主义”的科学书写:功利主义中的科技异化

科学研究是一项关于人类发展与命运的神圣事业,它需要科研人员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更需要遵守一定的科技伦理来保障科研事业的合理性,进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造福人类社会。而功利主义者以最大幸福原理和自利选择原理为依据,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权利与自由,提倡利己主义。功利主义过于理想化的特征使人过度崇尚物质,忽略精神价值与伦理道德的进步。小说《无影之人》中“唯科学主义”的科学叙事是对科学研究模式功利化的批判,深刻揭示了神经科学异化的主要原因。

“科学主义”(Scientism)认为,“自然科学是人类知识的典范,且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的信仰”^①。用社会理论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话来说,“政治意图已经渗透进处于不断进步中的技术,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变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状态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②。换言之,科学发展不仅加速了工具化的出现,也忽视了事物的人文意义。在《无影之人》中,玛格特(Margot)作为实验室领导范瑞思(Ferris)的学生,为了所谓的科学研究和科研事业,她将自己与过去的生活完全隔离,甚至选择忘记。为了保证实验顺利开展,她以“侵入者”的姿态闯入实验对象伊里胡的生活,并对其实施各种干涉与控制。为了获取数据和赢得伊里胡的信任,玛格特在实验过程中不惜假扮他的妻子,最终陷入痛苦的情感纠纷中。神经记忆科学实验室“唯科学主义”的科研日常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全景式的科技异化图。

健忘症患者伊里胡被家人送入记忆科学实验室治疗脑疾,然而科学家心中的伊里胡并非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一个有助于获取一手数据,证实实验设计及获得社会认可的“动物”。为了得到有价值的实验数据,科学家对伊里胡实施高强度的记忆、语言、视觉、听力等测试,感官刺激与情感欺骗等科学实验,最终将他物化为可操控的数据源。虽然科学家在顶级期刊杂志上发表了数篇高质量的科研论文,多次获得政府的奖励与拨款,但神经记忆科学实验室“唯科学主义”的运行模式忽视人在科学研究中的生命尊严,将人异化为实验工具,这种违背生命伦理的科研方式最终使E.H.研究项目从“治愈个体”异化为“堆砌数据”和“生产论文”的工具,也使整个科学实验室处于功利主义思想主导的氛围之中。

科学是人的科学,要求从事科学研究的科研人员具备良好的学术诚信与学术道德。科研人员学术诚信的缺失必然也会导致科技的异化。以范瑞思为代表的科学家因缺乏学术诚信与学术道德,将科学研究异化为一种“为科学而科学”的状态。作为神经记忆科学实验室的权威专家和E.H.研究项目的主要负责人,范瑞思在实验室其他科研人员心中却是“盗贼”的象征。因为实验室围绕E.H.研究项目撰写的科研论文必须征得范瑞思的同意才能发表,“不论谁设计的实验思路,不论谁记载的项目研究过程,抑或不不论谁撰写的研究论文,弥尔顿·范瑞思的名字都将出现在合作者最重要的位置”^③,以此来彰显他在该领域的权威。更荒谬的是,有些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在权威期刊上发表时竟然没有自己的名字,而只有范瑞思一个人的署名。面对范瑞思的学术霸凌,尽管记忆科学实验室的成员痛恨他“剽窃了我们的学术成果,他吸走了我们的鲜血,他就是一个小偷,他必须被惩罚”^④,但为了各自的学术事业和科

①曹志平,邓丹云:《论科学主义的本质》,《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4期。

②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③Oates, J. C. *The Man Without a Shadow*. London: Harper Collins, 2017, p.95.

④Oates, J. C. *The Man Without a Shadow*. London: Harper Collins, 2017, p.96.

研未来,大家选择忍气吞声。根据评论家札普的观点,作家欧茨在其文学作品中构建的现代社会通常具有“非道德的后人文主义世界(an amoral post-humanist world)”^①的特征,揭示了各种异化和自我欺骗,并通过颠覆性的认知超越人类现存的道德。因此,欧茨笔下的科学实验室是权力与资本共谋的竞技场,具有非道德的后人文主义世界特征,是技术理性僭越人性价值的缩影。

此外,范瑞思还有严重的师德师风问题。范瑞思虽已结婚生子,但在神经科学界,有关他对无知少女的侵犯,与学生、同事之间的绯闻人尽皆知。以玛格特为例,玛格特是范瑞思眼中的好学生,她对老师的态度就像“贞洁的女儿”一样,只有服从,没有背叛。范瑞思甚至违背师德伦理与玛格特开展了一段地下婚外恋。然而这一切对于受害者玛格特来说并非一种伤害;相反,她认为这样的师生关系不仅有助于建立科学事业,更有助于发展科学事业。所以,玛格特对范瑞思的越界行为坦然接受,并感叹“我不能想象没有他的生活……如果没有范瑞思的指导,我就不能成为大学的助理教授,不会有机会加入 E. H. 研究项目”^②,甚至她还将自己视为范瑞思的附属品。

托夫勒在论述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时认为:“进步再也不能以技术和生活的物质标准来衡量了。如果在道德、美学、政治、环境等方面日趋堕落的社会,则不能认为是一个进步的社会……进步再也不会是自动化的成就,也不会单以物质标准来衡量了。”^③导师范瑞思利用学生对科研成果的需求处处压榨学生;同样从事科学研究的学生玛格特为了学业,跨越伦理底线。这段有悖伦理道德的师生恋情是范瑞思和玛格特各取所需的体现,更是功利主义思想驱使下的一种科技异化。最终,神经记忆科学在科研人员道德伦理丧失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原本的向上与向善,沦为一种有悖科技伦理的异化科学。

二、“科技单向度”的科学书写:工具理性中的身份认同危机

“单向度”的概念由马尔库塞提出。他认为“当代工业社会……成功地压制了这个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压制了人们内心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使这个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单向度的概念揭示了现代工业文明对人性的异化与思想的禁锢,人类的思想、认知以及心理在科技单向度的思维中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危机与挑战。20 世纪中后期至 21 世纪初,神经科学迎来突破性发展,“脑的十年”计划推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记忆存储机制研究等技术革新,同时神经科学概念通过媒体与文学渗透入大众文化中。这一时期,后现代思潮解构传统身份认同,女性主义批判科学领域的性别歧视,冷战时期技术控制的阴影延续,文学中关于“科学与人性”的探讨也不断深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欧茨敏锐地捕捉到时代脉搏,她将神经科学实验室置于科学进步与伦理困境、男性霸权与女性觉醒、人类中心主义与后人类挑战等多重历史张力的交汇点,其笔下的科学实验室成为科技单向度思维的具象化载体,揭示技术如何将人类意识简化为可量化的数据,科学家与实验对象如何在技术系统中丧失主体性,进而深入探讨科技进步引发的身份认同危机与伦理困境,批判技术时代的工具理性和技术崇拜。

《无影之人》中“科技单向度”的科学书写首先表现为科技单向度的思维模式。无论科学家还是实验对象,他们均高度重视科学研究和科学数据。尽管玛格特在事业上是一位成功的女性科学家,但生活中的她却是一位冷漠无情,唯科学事业独尊的“机械女孩”^⑤。为全心投入科学事业,玛格特将 E. H. 研究项目视为生活的全部,甚至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对玛格特而言,“工作是她最大的快乐……记

① Zapf, J. C.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Ideological Critique in Joyce Carol Oates’s *Master Race*”, *The International Fiction Review*, 1989, 16 (1): 48–55.

② Oates, J. C. *The Man Without a Shadow*. London: Harper Collins, 2017, p. 93.

③ 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 年版,第 365 页。

④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 页。

⑤ “机械女孩”这一表述并非源于小说《无影之人》,而是在其小说《北门边》(*By the North Gate*, 1971)有专门的论述。另外里德洛娃(Daniela Rydlová)在论述欧茨创作技巧时也用了这个概念,他认为女机器人具备一切优雅特质,唯独缺乏生命力。具体详情参见 Rydlová, D. *A Serious Writer: Various Literary Techniques and Devices in the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Joyce Carol Oates from the 1960s and the Early 1970s*, Prague: Karlova University, 2018, pp. 26–28.

忆实验室以及 E.H.研究项目是她真正的生活”^①。在母亲病危之际,她表示“我别无选择,我必须得工作,我不能落下我的工作,我不能经常飞回密歇根”^②。为了得到一手资料,她将自己伪装成伊里胡的小学同学甚至前妻,利用谎言走进实验对象的生活,追求所谓的科学数据和科学真理。最后,玛格特为自己的学术不端感到纠结与害怕,担心“有朝一日她在科研方面的伦理问题被人曝光或者她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学术不端被人揭发”^③。玛格特的形象将马尔库塞的单向度概念具象化,因为她将科学技术视为“一种工具、一种物而存在,是奴役状态的纯粹形式”^④。玛格特对科学事业的单向度思维使她失去了社会人的本质,沦为一个只懂科技而灵魂苍白的“空心人”。

《无影之人》中科技单向度的科学书写其次表现为工具理性中的身份认同危机。在整个科学研究过程中,不论科学家还是实验对象总是不断追问“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是否有灵魂”等身份问题。经过多次肯定或否定,他们最终迷失在科学的世界,成为两个没有影子的“幽灵”^⑤形象。一方面,叙事者聚焦健忘症患者伊里胡的心理世界来体现其内在死亡与自我认同危机。在加入神经记忆科学实验室之前,伊里胡是美国费城一户大家公子,爱好体育运动,喜欢画画,关心政治,热心慈善。然而在一次露营活动中,伊里胡因脑部病毒导致神经记忆系统受损,失去了记忆新信息的能力。他对现有事件的记忆不到 70 秒,而对著名诗篇、历史日期,重要数据、电影桥段及著名的演说词却记忆清晰。鉴于这例罕见的精神疾病,一家位于宾夕法尼亚的神经科学实验室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成立专门的记忆科学实验室,旨在突破现有的记忆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加入实验室后的伊里胡深受科技单向度思维的摧残。随着测试复杂程度的加深,原本彬彬有礼的伊里胡很快陷入抗拒和混乱的状态,他就像“一个溺水挣扎的落难者”^⑥,一直处于自我迷失和身份认同危机中。面对长达十几年无聊的测试、冰冷的机器和谎话连篇的科学家,伊里胡“已经记不起身边的事物,也记不起自己遇见的新面孔,因为他已经迷失了自我”^⑦,最终他开始不断追问有关灵魂和身份认同的问题。

一个人对身份产生质疑,是其身份迷失的最有力体现,也是身份无意识和身份认同危机最为直接的表达方式。对于身份问题,聂珍钊在探讨人类身份时将人性因子视为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也就是说:“人性是人区别兽的本质特征,而人性因子指的是人类在从野蛮(Savagery)向文明进化过程中出现的能够导致自身进化为人的因素。正是人性因子的出现,人才会产生伦理意识,使人从兽变为人。”^⑧因此,人类伦理选择的实质是做人还是做兽。故事结尾,当伊里胡被问及“我们是谁”时,玛格特放弃其内心的兽性因子,不再将伊里胡视为动物,而是发自肺腑地劝告他应该把“我们是谁”变为“我们是什么”的问题。可见,深受科技单向度思维影响的玛格特最终将身份认同问题指向“我们是什么”这一类似科学研究的客观问题。

在技术理性统治的语境下,人文学者关注“我们是谁”,而科学家更多关心“我们是什么”的问题。然而不论做出何种选择,“伦理选择是人的本质的选择,是如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身份选择”^⑨。神经记忆科学实验室的科学家不再致力于探索生命的本质,而是将科学研究异化为一个维系技术霸权的工

①Oates, J. C. *The Man Without a Shadow*. London: Harper Collins, 2017, p.245.

②Oates, J. C. *The Man Without a Shadow*. London: Harper Collins, 2017, p.320.

③Oates, J. C. *The Man Without a Shadow*. London: Harper Collins, 2017, p.213.

④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2 页。

⑤“幽灵”(specter)一词源于弗洛姆《希望的革命:通向人性化的技术》(*The Revolution of Hope: Toward a Humanized Technology*, 1968)一书中,用来强调 21 世纪因大规模的物质生产和消费的、由计算机所控制的完全机械化的幽灵社会。这里的“幽灵”一词并非传统意义上超自然的幽灵形象,而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述,体现过度机械化和技术化的社会形态对人类的威胁。参见 Fromm, Erich. *The Revolution of Hope: Toward a Humanized Technology*. New York: Harper&Row, 1968, p.1.

⑥“溺水女孩”(drowned girl)的故事在小说中共计出现 20 余次,虽然有关死者的说法很多,但大多是以不确定的口吻陈述。由此可见叙事者对此事的不确定性,这一场景为故事烘托出一种模糊不清的气氛。参见 Oates, J. C. *The Man Without a Shadow*. London: Harper Collins, 2017, p.1, p.121, p.122, p.126, p.130, p.169, p.262, p.263, p.266, p.272, p.311, p.316, p.334.

⑦Oates, J. C. *The Man Without a Shadow*. London: Harper Collins, 2017, p.337.

⑧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2011 年第 6 期。

⑨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人类文明三阶段论》,《东吴学术》2022 年第 5 期。

具,深刻暴露了现代社会中“人被技术掌控”的生存困境。科学家玛格特因实验室“去情感化”的规则而陷入身份认同危机,实验对象伊里胡因记忆被篡改而丧失自我,本质上都是现代社会过度使用工具理性导致的人性异化、工具化、碎片化与价值虚无化,是“技术理性”与“人类主体”冲突的缩影,演绎了工具理性如何通过“科学书写”解构人类身份的多重维度,批判了工具理性的认知局限。

三、“以人为本”的科学书写:生活世界中的伦理之思

面对科学技术的双面性,如何处理科技与人文的关系及如何看待“科学理性至上”和“摒弃科学回归人文”等成为当下热议话题。早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为了拯救欧洲现代科学危机,胡塞尔(Edmund Husserl)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①中提出“生活世界”这一哲学概念。他强调,“科学的世界的知识是‘奠立’在生活世界的自明性之上的。生活世界对于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或对于研究集体来说,是作为‘基础’而预先给定的”^②。可见,生活世界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前提与基础,也是保障科学研究真实性和有效性的源泉。然而,生活世界也并非个体的主观世界,而是日常生活的客观世界,它并非强调生活世界中的科技与人文、知识与价值对立,而是提倡“回归一种真实的,知识与价值、人文与科技统一的,完整的生活世界”^③,以彰显科学人文的重要性。

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欧茨在其著作《作家的信仰:生活、技艺与艺术》中曾说:“我一生都对人性的奥秘深深着迷。我们是谁?我们为何在此?此处是何方?人类存在的谜团逐渐融入物质本身的奥秘,那些亘古未解的哲思之问始终萦绕。为何存在万物而非虚无?意识的目的为何?人类探索的意义又是什么?”^④虽然我们无法完全阐释人性的奥秘和人类探索的意义,但欧茨的科学书写通过其充满思辨张力的文本实践,深刻论证了科学发展与人文精神的本质——任何脱离人文关怀和价值引导的科技发

展,必然导致科技异化与人类身份迷失。

“以人为本”的科学书写主要以人为中心,注重科学的人文化、人性化和伦理化。林莉在探讨伦理选择时认为,“伦理的含义是关乎人的生活世界里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人格建构和人伦秩序,主要体现在如何处理人与人、社会与人、人与自然的

关系中人应该怎么做”^⑤。在小说《无影之人》中,欧茨在探索现代科技发展奥秘的过程中既有对先进科学的再现,也有对科技危机的批判及危机出路的探寻。正如评论家黑根所言,“这部小说基于人类的不幸,提出了有关人类科学实验的伦理问题以及科学进步过程中的人文主义等有趣问题”^⑥。换言之,欧茨抛出的命题不仅涉及科学技术面临的危机与困境,同时也通过构建科学家的生活世界来展示她对科学技术和人类命运的深度思考,以期传递科学与人文并重的科技伦理思想。

玛格特与伊里胡的关系最初表现为捕食者和猎物。对玛格特来说,伊里胡最初的存在价值只是获取实验数据。然而面对神经记忆科学研究的困境,热衷科学事业的玛格特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科学研究过于极端,于是决定不再单纯依靠实验数据来分析伊里胡的病症,而是在情感反思中将伊里胡的形象打上了“生命化”的烙印。最后,伊里胡不再是实验数据,而是一名运动健将,是姑母梅特森的侄儿,更是她的“生命”^⑦和“生活的全部”^⑧。为了解释伊里胡画作中的溺水场景,玛格特一改曾经唯科学仪器和实验数据的科研方式,先后通过与人沟通,给伊里胡的家人写信及电话咨询政府部门等方式调查事件的真相。为了拯救伊里胡的记忆,玛格特为他举办个人画展,接纳他的艺术创作。玛格特从只关注实验数据到接受艺术审美的转变,体现了她开始基于人文主义展开科学研究,也隐射她对自己曾奉行的唯科学

①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158 页。

②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158 页。

③许继红:《雷蒙德·威廉斯技术解释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52 页。

④Oates, J. C. *The Faith of a Writer: Life, Craft, Art*. London: Harper Collins, 2003, p.37.

⑤林莉:《麦克尤恩〈儿童法案〉中的伦理困境与伦理选择》,《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6 期。

⑥Heggen, T. *The Man Without A Shadow——by Joyce Carol Oates*, <https://www.frombriefstobooks.com/?s=The+man+without+a+shadow>.

⑦Oates, J. C. *The Man Without a Shadow*. London: Harper Collins, 2017, p.348.

⑧Oates, J. C. *The Man Without a Shadow*. London: Harper Collins, 2017, p.327.

主义科研理念和科技单向度思维的反思。当谈及爱情时,她逐渐意识到虚假爱情给生活带来的纠结与痛苦,她不仅承认自己的虚伪,还开始反思医学中的道德伦理问题。最后,当“数据代码”被“主体间的情感联结”和颇具人文主义情感的“生活世界”取代时,玛格特与伊里胡的关系也从纯粹的数据关系转变为真实爱情。那些原本被工具理性桎梏、充斥数据冰冷性与技术异化逻辑的科学书写最终回归到充满生命温度的人文对话。

“以人为本”的生活世界还表现为科学家对家园概念及家庭空间的探讨。当“机械女孩”玛格特认识到生活世界的重要性时,她选择关闭记忆实验室并建构家的概念和真实的家园场所来弥补其生活世界的缺失。为了让伊里胡拥有一个真正的家园空间,玛格特愿意“为他提供一个家,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①。因为只有住在家里,“他才会舒适自在,当住在不熟悉的住所时,他可能会彻底迷失自己”^②。此外,玛格特还将伊里胡居住的养老院称为“家园护理中心”,因为护理人员对玛格特和伊里胡关爱有加,那里有着如家般的温暖和归属感。最后,故事在玛格特和伊里胡嘘寒问暖、相互照料、夫唱妇随的日常生活场景中落幕,表明他们在“家”的温暖中找到了心中的宁静,在彼此成为家人的陪伴中收获幸福与温馨。

对欧茨的伦理思想,评论家曾说:“欧茨以犀利的笔触提出了自己关于道德的另一番见解……她既不故弄玄虚,也不溺爱读者……她通过描绘一个在道德和死亡方面都没有清晰界限的世界,迫使读者直面人类关系中隐含多变的邪恶。”^③在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技术全面发展的当下,欧茨在其另一部以神经科学为主题的小说《漂流在时间里的人》中也借人文主义的伦理情感来化解科学困境。故事中的主人公拒绝被未来的技术极权社会同化,最终选择留在1960年代。这种“时空逃逸”的叙事策略,通过否定现存秩序,肯定人本价值,“有助于解释欧茨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哲学思想指涉”^④。由此可见,欧茨科学书写中所呈现的人文主义元素,本质上是对技术理性统治下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反思,以期重新激活人性的潜能,因为科学知识尽管揭示了许多普遍性的东西,“但是关于构成个人生活的特殊色调和纹理的那些温暖而亲切的事物,它却一无所知”^⑤。

对于生活世界的作用,胡塞尔认为,“如果我们不再沉浸于我们的科学思考之中,我们就会认识到,我们这些科学家毕竟是人……因此,全部的科学就随同我们一起进入到这一纯粹‘主观的一相对的’生活世界之中”^⑥。《无影之人》中“以人为本”的科学叙事通过构建具有人文主义情感的生活世界,彰显了两种文化融合与平衡的可能性。正如曾艳钰在论述科技与人文融合的话题时所言:“在探讨科技与人文融合的诸多挑战中,首要考虑的是如何确保人文精神的主导地位……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将人文关怀作为技术应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⑦只有当科学不再垄断真理的定义时,人类或许才能在技术的洪流中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影子。

结语

对于文学作品的功能,杨金才认为:“任何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会涉及人的精神向度和伦理观照,它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人类经验、情感和思想的馈赠。”^⑧《无影之人》中的科学书写不仅探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科技异化与人本危机,揭示科技发展与人类命运的深刻矛盾;同时也通过构建“以人为本”的生活世界来阐释危机救赎的路径,警醒世人重视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平衡,以促进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欧茨将自己视为一位“永不妥协的艺术家”,并

①Oates, J. C. *The Man Without a Shadow*. London: Harper Collins, 2017, p.337.

②Oates, J. C. *The Man Without a Shadow*. London: Harper Collins, 2017, p.334.

③Hoeveler, D. "Postgothic Fiction: Joyce Carol Oates Turns the Screw on Henry James", *Studies in Short Fiction*, 1998, 35(4):355-371.

④Tromble, T. "Joyce Carol Oates: Fantastic, New Gothic and Inner Realities", *Journal of the Short Story in English*, 2014(62): 1-12.

⑤罗素:《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制》,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页。

⑥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58页。

⑦曾艳钰:《科技人文融合:人工智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与国际传播》,《东吴学术》2025年第1期。

⑧杨金才:《文学教育的功效——基于“外语教育学”的思考》,《外语教学与研究》2025年第2期。

呼吁“建构艺术家的伦理准则和美学追求”^①。欧茨对科技异化的文学性描写不仅是对科技伦理困境的美学回应,更是对现代科技危机的伦理之思,其具有人文主义情感反思的科学书写如同刺破“技术至上”的手术刀,既解剖了现代社会科技异化的病症,也为理解技术时代的人类命运提供了启发性思考。欧茨的小说启示人们摒弃“唯科学主义”的傲慢与工具理性的桎梏,在科技实践中重铸情感联结与伦理共情的基础,建立一种充满人性的科学观念。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and Ethical Reflections: On the Scientific Writing in *The Man Without A Shadow*

SHI Jiaxua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In her novel *The Man Without A Shadow*, Joyce Carol Oates explores the ethical challenges in modern neuroscience through three modes of scientific writing: scientism, one-dimensional thinking and human-centered reflection. Scientism, represented by the “science for science’s sake” model in memory research, reveals the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driven by utilitarian thinking. One-dimensional thinking reflects scientists’ data-oriented worldview and identity crises, critiquing the cognitive limitations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Human-centered reflection, mediated by emotional bonds and the life-world, offers strategies to confront techno-ethical dilemmas. Oates’s scientific writing does not simplistically judge technology, but diagnoses the ethical crises of modernity, guiding readers to integrate ethical thinking across science and the humanities, and demonstrating the unity of scientific truth and humanistic goodness.

Key words: Joyce Carol Oates; *The Man Without A Shadow*; scientific writing; ethics

(责任校对 张伟平)

^①Oates, J. C. “Art and Ethics? —The Futility of Art”, *Salmagundi*, 1996(111): 75–85.